

关于中国现状的忧虑

老林学兄兼主席阁下：

（说明：我至今只得到世界上各政府赐予过一次选举权，就是投票选举 80 年的清华学生会主席，故称敬称“主席”。我写过“回忆 1980 年的清华学生会选举”，发表在东京《民主中国》月刊 1990 年 6 月号。<http://www.mtime.com/my/jingzhao/blog/2217182/>）

自从 83-84 年围绕清华学生会选举的公开辩论和私下“煮方便面论英雄”以来，我们之间就没有交流的机会了。那一次辩论中为我“拔刀相助”的勇士黄虹毕业时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李政道门下研究生，胡维清毕业时考入北大经济系研究生，逃过校方的暗算，免除了我的内疚。我毕业时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由党委王凤生副书记拍板-我其实很感谢他），赶出北京发配到兰州的重离子所，所幸华东师大的吴铎导师（时任校教务长，六四时任校党委书记）主持公道，坚持把 1985 年国家教委的唯一社会学出国资格给与成绩第一的考生，华东师大党委也没有计较我报名时“预备党员”、报到时“非党员”的尴尬处境，使我 1986 年终于到日本大阪大学留学。

我到日本后，接手由公派留学生主编的刊物《燕鸣》，正好遇到方励之-胡耀邦事件，运用我的“社会调查方法论”专业，在留日学生中进行问卷调查，公布在《燕鸣》上（发行 600 册）。此事后来由香港《争鸣》、台湾《中央日报》等报道，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最大政治事件”（领事引用时任教委主任李鹏语），我除了“自我批判”外，办好旅欧考察签证的护照也被没收。

学兄可以推知，六四这样的事件发生，我被推出来担任学生代表，硬着头皮组织抗议活动。如果是在美国或欧洲，事情倒很简单，但身处日本，给了我独特的考察国际政治机会。大使馆、领馆（大使杨振亚据说是胡耀邦派，一个杨派入抗议组织的留学生特务告诉我杨要加入万里的“流亡政府”等）、日本政府的各种机构（文部省、入管局、地方警察、国家秘密警察、各政治团体）、台湾（包括“李登辉特使”）、美国领馆（“美国政府永远欢迎赵京这样的人”）等，都找上门来。感谢我在清华的经历（特别是学兄的教导），起码知道自己对中国政治实际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最终“求仁得仁”，实践我们都认之为人生楷模的马克思的流亡思想家生活。我是唯一被停掉教委奖学金（至今没有说明）并最终失去护照的公派留学生（驻日公使唐家璇因为勾结日本政府迫害中国公民有功，后窜升为外交部长），唯一因为政治迫害（所谓“有碍日中友好”）被日本政府赶出学校的中国学者（虽然我 1992 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时，包括学部长在内的日本教授都只有硕士学位），唯一因为不愿签署有辱人格的“匪区入境申明”而被至今没有进入台湾的“民运人士”（尽管有行政院长李焕的邀请），唯一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恶意调查数年的政治移民。。。我在日本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教会开的结婚证明不被承认（拿不到各政府的证明）。最终，我签发给自己的护照（因为原有的护照得不到延长）得不到各国当局承认，只好向美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否则，不知道要被各国政府驱逐到地球的哪个角落。我也不顾朋友们的劝告，投身美国的反战、反失业、全民医疗保险等运动，至今保持美国劳动党会员的资格。

我写这些，希望会有助于学兄理解我寄去的《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韦伯论社会主义》、《作为中国转型参照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国家形态与社会秩序》等书。当学兄掌管北大党委时，我本来想劝骂一通：“不要把北大当成你的土伦！”（拿破仑由此成名）。当学兄居吉林党委庙堂之高时，我委托朋友联系过，秘书答曰“不便与境外联系”。前不久，听说吉林国企通钢工人愤而打死资本家（我尊敬的安那祺主义英雄柏克曼在卡内基钢铁公司非人道对待工人时，愤而枪击其代理，被判刑 22 年），我不由得再次想起学兄，应向工人伸出援手。但同工物系的周锋锁同学（较我们晚）告诉我，学兄已经被强制“退岗”了，才知道学兄的近况。我同时在网上查到几则关于学兄的报道，不由得再次与学兄联系，所幸现在我们可以通讯交流了。

我离开中国 23 年，至今无法跨入国土，游学于日美之间，对中国的国情本来没有什么发言权。而师兄一直服务于政府，现在如果能够自由发言的话，实在没有必要浪费在“国际经济”等话题上（虽然师兄也是经济学专家，不过中国的“专家”、“学者”都由权力或资本所豢养，没有不要列伍其中），而应该专注于师兄深通的中国国内政治体制上。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危机，赋予师兄任何别人不能、不愿肩负的重任。当国民党被李登辉出卖时，那些有头脑、有心、有血的国民党后裔敢于树起“新党”的旗子，起到阻止进一步国民党变质的功效。现在，共产党的理想、基根等已经被江泽民集团出卖得一干二净（胡、吴、朱、温等人只是技术官僚，不足以论英雄），以师兄的学识、能力，本该担负起总理或总书记的重任，却连个“边疆省委副书记”这样的职位都不为当权者所容，难道就这样屈辱地任人屠宰吗？

对于担负中国前程的重任，师兄还年轻，怎么能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自动放弃战斗、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呢？如果师兄能够起码向蔡锷那样，树起“保护共和国”的旗号（不管叫“社会主义党”、“社会劳动党”还是“新共产党”，只要坚持自由、民主、人权、经济平等、社会保障等基本价值，提出新闻自由、结党自由、直接选举、“平反六四”、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保障雇用等口号），应该可以达到查韦斯在委内瑞拉那样的结局（查韦斯的政变不是为了直接夺权，而是唤起民众来推翻腐败的资产阶级政权）。顺带指出，近代社会主义运动（例如，第四国际的决议）已经确认了“一党专政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致命肿瘤”这一重大理论成果（我放了一些不太刺激当局的类似理论文章在<http://vip.bokee.com/name/jingzhao>）。与其为当局的野蛮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继续作一块裹尸布，为什么不为我们民主的、人道的、文明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娘的诞生作嫁妆？我们在香港，有长毛同志等坚守立法会席位，力争在将来的直选中取得“特首”选举胜利，可以鼓舞师兄在内地的社会主义斗争。我也会尽力，在遏制日本的军国主义倒退、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军事霸权、解消对准中国的美日军事同盟（我的第一本书就是 98 年出版的《美日同盟》）、废除核武器（这是我们作为核物理专业的特别使命）等国际政治方面努力。

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革命，付出了最大的牺牲，怎么能这么轻易地被出卖呢？如果我们能够阻止当局的野蛮倒退，个人的一切（包括生命）算得了什么？

遥祝奋起！

赵京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http://cpri.tripod.com>
人道中国<http://h-china.org>

2009 年 8 月 1-3 日 美国圣拉蒙

[不知师兄能否受到此通讯，也不知何时能得到回复。如果一个周以后没有回复，我会考虑以公开的形式，向所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呼吁。]